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畅销书摘》月刊

《畅销书摘》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书摘类月刊，以“一卷在手，可知多本精华百本信息”为宗旨，坚持“选得精彩，摘得精练，编得精心”的“三精”方针，广收博采最具权威性、代表性、时效性的中外畅销书，以选登、介绍、摘编中外优秀社科、文艺、文史类图书为主，既介绍已面世的畅销佳作，又引荐即将出版的畅销新品，也选摘曾经畅销但己为今人生疏的畅销名著。它既是丰富知识，获取信息。愉悦身心的读物，也是读书、购书、藏书的指南。

本刊所选介图书主要为文艺、纪实、社科、人物四大类，其常设主要栏目有：长篇短读、社会纪实、人物大观、风云历史、社科之窗、经济话题、译苑新作、秘闻轶事、文化沙龙、美文品读、五味斋、书林折枝等。

本刊邮发代号：28—216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本刊编辑部同时办理邮购（破月破季均可）。

本刊地址：南京中央路 165 号江苏人民出版社《畅销书摘》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09

电话：（025）6638215

反恐怖行动写真录

恐怖克星
——秘鲁藤森政府的反恐怖行动
“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当代秘鲁最著名的舞蹈表演艺术家兼指导卡利多刚刚搬进利马市苏尔基约区第一大街459号，就成了这一街区最令人瞩目的女性。这也难怪，天生丽质和后天的艺术修养造就的不凡气质，令她超凡脱俗，靓丽多姿，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人们注视和谈话的焦点。

不过，卡利多没有想到，这一次向她注目的人大多不是欣赏她秀美的体态与倾城的姿容，他们用笔记下的也不是她的三围，而是她采购的面包的数量，购买的男衬衫的尺码，抽的香烟的品牌，所使用的药品的名称……更奇怪的是，他们对她倾倒的垃圾也颇青睐，经常是整包取走。当她外出时，这些人更是虎视眈眈，唯恐错过任何细节。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女主人那辆绿色小卧车的车窗涂的是深颜色。看来卡利多是不喜欢过分招摇的，否则哪一个美丽的女性愿意这样深颜遮掩过闹市呢？

她更不会想到，所有与她有关的材料每天经专人分析后都准时送到了秘鲁反恐怖局局长的办公室。刚开始几个月，卡利多似乎除了那辆小卧车有些出奇外，其它都显得很平常。8月中旬之后，情况明显不对了。卡利多购物的数量与品种和她的实际需求不吻合。她买的男衬衫，尺码比男主人身材大得多；她买的治牛皮癣的药，她的家人也用不上；她倾倒的垃圾中有温斯顿牌香烟头，这也不是她享用的。最大的破绽是，她每天购买的面包数量足够10个壮汉享用，纵使卡利多无减肥之忧，她也吃不下这些面包的一个零头。看来，好胃口的人不可能是卡利多，只能是另有其人。而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喜欢抽温斯顿牌香烟、患有牛皮癣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秘鲁最大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首脑人物。

秘鲁警方是如何盯上本国最有名的艺术家的？原来，几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警察找到了一盘录像带，录像中有古斯曼与卡利多两人跳舞的镜头。音乐声中，两人相拥相依，如痴如醉。警察大喜过望，一张围绕卡利多的蜘蛛网张开了。装扮成小贩、行人、电工、水暖工、抄表员、油漆匠的侦探遍布卡利多的二层小楼附近，通往该楼的各个路口都有专人把守。这一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古斯曼这条“大鱼”恐怕难以逃脱了。

1992年9月12日星期六，平日里在第一大街来去匆匆的上班族大都呆在家中享受一周一次的家人团聚时光，卡利多的小楼前突然变得空旷起来，在小楼附近游来逛去的侦探目标一下子显得突出了许多，如果继续进行监视，可能会引起古斯曼的怀疑。可不能让到手的“鱼儿”溜掉了，警察决定晚上便收网捉鱼。

夜幕降临时，一场别开生面的烧烤晚会在459号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进行着，身着各式服装的红男绿女三五成群地汇聚在一起，纵情欢娱。在卡利多小楼对面的街道上，也似乎不经意地停着一辆小汽车，一对热恋人正在里面相拥相亲。实际上，这些寻“欢”作“乐”的人们都是便衣警察，他们堂而皇之地靠近了古斯曼，抽紧了收网绳索，可“鱼儿”丝毫没有感觉。

突然，459号的大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子，那对“沉溺爱河”的便衣警察及时向正在吃烧烤的秘鲁反恐怖局局长、本次行动的总指挥发出了暗号。30余名特工人员从各个隐蔽的角落跳了出来，迅速把她架到一旁，

一拥而入，一刹那就控制了整幢楼房。

楼内所有人都被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弄得措手不及。待听到警察的鸣枪声时，一个身体肥胖、耳鬓已有花白头发的人手里拿着的书还未来得及放下，几名显然是保镖的人迅捷地围住他。这位镇定自若的读书人平静地伸出双手，自言自语道：“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指挥这次行动的安东尼奥·维达尔·赫莱拉将军在确证对方的身份后，不无激动地说：“在你的一生中有赢的时候，也有输的时候，如今就是你输的时候。”就这样，全秘鲁甚至整个南美洲人闻之色变的恐怖巨头——古斯曼落网了。在几十名特工人员的严密监视下，他被迅速送上囚车，与他“同行”的还有他那暴跳如雷的妻子、“光辉道路”第二号人物埃莱娜·伊帕拉吉雷以及该组织其他八名领导成员。

古斯曼的落网轰动了全世界，它被视为“秘鲁反恐怖斗争最伟大的胜利”。消息传出之后，秘鲁举国欢庆，世界舆论也为之震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对这次行动的成功，我们向秘鲁政府表示祝贺。”智利、阿根廷、巴西、古巴等拉美国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充分肯定了它在国际反恐怖战争中的积极意义。正在为大毒梟埃斯科瓦尔越狱潜逃而大伤脑筋的哥伦比亚政府不无羡慕地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与秘鲁同样的成就。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向秘鲁总统藤森表示祝贺，并命令加强对玻利维亚—秘鲁边界的控制，防止“光辉道路”的漏网之徒把玻国作为避难所以及反扑的根据地。国内舆论甚至认为，抓获了古斯曼使藤森总统在4月份联合军方发动“自我政变”、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疯狂举动”有了一定的“合理成分”，由此看来，古斯曼这条“大鱼”实在太大了，人们只求能绳之以法，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古斯曼真的这么重要吗？

拉丁美洲的“红太阳”

现年57岁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是秘鲁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名震遐迩的秘鲁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的首领，也是秘鲁国内最值钱的首号通缉要犯，秘鲁当局为他的项上人头开出了100万美元的高价。就连藤森总统本人也称之为“残忍的天才”。有人说在秘鲁只要一提及古斯曼就足以让人心惊胆战。曾有这么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一个来自美国的观光客问当地小孩拉丁美洲什么最有名，回答令他大为吃惊。孩子首先提到了“古斯曼”，见对方一脸疑惑，又补充说：“还有亚马孙河。”

绵延6000多公里的亚马孙河抵不上一个古斯曼，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的22年中，亚马孙河在秘鲁境内的河段仅仅淹死过几百人，可古斯曼的“光辉道路”成立22年来，它所进行的武装破坏却有上万次，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3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5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秘鲁外债的总和。与古斯曼的赫赫“武功”相比，喜怒难测的亚马孙河毕竟是逊色多了。

古斯曼于1934年12月3日出生在秘鲁阿雷吉帕省一个巨商之家。但是，他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是一个私生子。这个迥异于常人的秘密自他懂事起就折磨着他，并对他后来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先由舅舅们抚养，后来他的父亲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收养了他，他被送入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过惯了寄人篱下生

活的古斯曼不爱说话，但意志坚硬如铁，又博闻强识，天资过人，熟悉他的老师和亲戚都说，他最适合读书，如将来能在学海遨游，一定前途无量。中学毕业后，古斯曼果然顺利地进入了圣奥古斯丁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此时的他对学业用力甚勤，给不少人留下了“读书种子”的好印象。没有人想到，古斯曼在此期间最着迷的却是当时流行的激进思想。在他的眼中，镇压过反对派、搞过大清洗的斯大林是一名“不彻底的革命者”。有幸领教他的固执的人也根本未曾料到，以后笼罩秘鲁长达 22 年的极左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在这个时候就已在古斯曼心底酝酿并抽枝展叶了。大学毕业后，古斯曼接受了阿亚库乔大学校长的聘请，成为该校的哲学教授，不久即蜚声校园。他的滔滔不绝的口才，他的坚毅、执著，在同事、学生中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香波”，意为只要沾上一点，大脑马上就会被“洗得清彻透明”，而且永远散发出让人难以忘怀的“余香”。古斯曼在校园中广结同道，他虽然没有把阿亚库乔大学建成秘鲁的哲学中心，却成功地把它变成培养信徒的摇篮。也正是在阿亚库乔大学，他结识了芳龄十六、貌美如花的少女奥古斯塔·拉托里。她是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其时尚未走进大学校门。拉托里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大她 10 岁的“教授”，一直在躲避他那肆无忌惮的追逐目光。可古斯曼却并无后退之意，为了赢得拉托里的芳心，他每天坐在她的家门口，让她在无可躲避的目光下进进出出。拉托里先是被这位古怪执拗的“静坐者”弄得心烦意乱，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也就从不习惯到习惯，并为他的爱所感动，最后还疯狂地爱上了他。不久，古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同奥古斯塔结成连理，成为当地人们艳羡的一对佳偶。事业与爱情的丰收使古斯曼从小潜伏的自命不凡的性格得到“发扬光大”。他深信，自己不仅是一个忠贞的情人、伟大的导师，而且是秘鲁未来社会的当然领袖，“肩负着民族和世界革命的重任”，要解救秘鲁人民于水火中。凭着这种幻想点燃的理想之火，1964 年，古斯曼加入了秘鲁当时最大的左翼组织——“红旗”。凭着丰富的理论素养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古斯曼很快在“红旗”里崭露头角。1967 年，经过几番明争暗斗，他成为“红旗”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古斯曼本人对“红旗”的行动纲领并不满意，因此，登位后立即着手改革，于 1970 年用“光辉道路”取代了“红旗”，他自己仍然任最高领袖。

古斯曼对“光辉道路”情有独钟，这根源于他对秘鲁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崇拜。所谓“光辉道路”就是“走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指引的光辉道路的共产党”的意思。它主张建立“印第安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恢复古印加的自然农业生产模式，政治上建立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应当说，古斯曼这些理论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诱惑力的。秘鲁是印第安人的故乡。古代，印第安人曾在此建立过印加帝国，创造过璀璨的印加文明。但是，自 1533 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就入侵印加古国，征服了秘鲁。秘鲁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到 1821 年，他们才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赢得了独立。但是，独立后的秘鲁并没有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秘鲁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宁，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秘鲁的军人政变屡有发生。长期的动荡影响了秘鲁经济的发展。到 90 年代，秘鲁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外债高达 200 亿美元。70% 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在秘鲁的 800 万劳动人口中，有 100 万人长期失业，另外的 50% 处于

半失业状态，而月通货膨胀率则高达 30%。10 个 6 岁以下的儿童中，有 6 个营养不良。而古斯曼所在的阿亚库乔山区又是秘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位于秘鲁中部，曾是古印加帝国的中心，当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的耕种方式落后，风俗习惯奇异，常常是人们打趣嘲笑的对象。到了 60~70 年代，虽然现代文明的春风也徐徐吹进了这片土地，但它对当地仍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基础撼动甚微，相反，涌进来更多的是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名目繁多的盘剥。因此，古斯曼的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了当地贫困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渴望摆脱歧视和剥削的心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光辉道路”很快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并不断发展。

古斯曼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依托阿亚库乔大学，将触须伸向了秘鲁的各个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的各个支部和外围组织，又依托阿亚库乔山区，在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等省的农村中也建立了基层组织，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农民、大学生、工人等各个社会层次参加的严密网络。古斯曼对成员要求极高。首先，他要求每个参加“光辉道路”的青年男女必须一方面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一方面聚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分析时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后，他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此后，再经过长期的“实践”，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如绑架、勒索、爆炸、暗杀、传递情报等活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能力，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的核心小组，成为“战士”或“斗士”。古斯曼认为，只有这样，发展的成员才能做到思想成熟，立场坚定，为“光辉道路”献身。

按规定，核心小组的成员白天照常生活和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从事组织委派的秘密活动。每个核心小组成员一般是五至九人，其中一人为组长，两人负责行动，一人负责培训和发展成员，还有一人负责思想教育。小组与小组间单线联系，没有任务时不相来往。小组成员一般不允许在自己居住或工作的地区活动，这一方面是避免暴露身份，另一方面是防止他们由于亲情与家乡观念，执行任务时下不了手。另外，组织内部的纪律也非常严明，对那些行为不检点、不服从命令的人，古斯曼从来都是不手软的。

“光辉道路”的各级组织都要接受军事与政治双重领导，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一般以政治领导人为正职，除非有大的军事活动，军事领导人才能暂时升为正职，每个小组以上建立有不同层次的组织，最高层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古斯曼本人兼军事与政治组织的双重领袖职务。

“光辉道路”的主要资金渠道是“税金”，它通过向其控制的众多农民和收购古柯叶的毒品贩子征收“产品税”，每年可获得 200 至 400 万美元的高额利润。这笔资金的管理很严，一般用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生活、活动，偶尔也用作成员的司法诉讼费，无关人员很难启动这笔巨额资金。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来看，“光辉道路”都如同古斯曼精心设计的“常山蛇阵”，击尾头迎，打身肢动，各个环节攻防应变灵活自如，令进攻者防不胜防，因此人们都称“光辉道路”是秘鲁社会中最有组织的一个集团。

其实，领教过“光辉道路”厉害的人都知道，古斯曼控制“光辉道路”靠的不仅是他超一流的组织能力与手段，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蛊惑性宣传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只要你加入这个组织，就无时不在接受他那浓浓“香波”的沐浴与洗礼，他的组织成员人手一本《沿着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

《光辉道路前进》的小册子，每个人除了记住其中的基本观点外，还必须背诵出其中每一句话。这种领导艺术牢牢地控制着成员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使广大的追随者成为其随心所欲的应用工具。一旦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判断能力与思维功能，古斯曼的言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圣旨”，靠着这种独特的本领，古斯曼稳稳地安坐在“光辉道路”的“教皇”之位，每日接受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他们尊称他为“贡萨洛主席”，是拉丁美洲的“普卡·因蒂”，意为“红太阳”。这种类似宗教的“洗脑”工作可以说是彻底的，以至一些被关进监狱里的“光辉道路”成员每天在服完类似中世纪的劳役后，还要无休止地背诵“贡萨洛著作”。

南美最大的恐怖组织

应该说，“光辉道路”最初的宗旨是反映了印第安农民的要求的，古斯曼希望推翻秘鲁现政权，按自己的“主义”来治理秘鲁，把秘鲁治理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因此，“光辉道路”在成立后的几年间，主要的行动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种方针与当年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相似之处。古斯曼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学到”什么，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思想与当年流行的左派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点看，“光辉道路”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古斯曼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魔头。没有他在阿亚库乔大学的哲学基础，古斯曼不会凭空构想出他的改革社会的蓝图，没有阿亚库乔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与尖锐的阶级矛盾，古斯曼的思想也不会找到信徒。因此，“光辉道路”最初应该是一个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而不是后来人人切齿痛恨的恐怖组织。

“光辉道路”最初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山区省份，这些省份经济落后，主要是印第安农民，“光辉道路”在这里可以找到支持者。他们在这里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为进一步活动筹集经费，弥补因组织迅速扩大而出现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

1980年，秘鲁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军人统治，首次举行了自由选举。对于饱受军阀统治的秘鲁人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可古斯曼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件事的意义，认为自由选举是资产阶级搞的老一套，这意味着秘鲁会加速资本主义化，对革命运动是一种危害，因此必须迎头痛击，以切断资本主义对秘鲁的渗透。“光辉道路”的战略重心立即转移，古斯曼率领他的勇士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宣布对秘鲁政府全面实施“人民战争”。他们在阿亚库乔捣毁了一个投票站，以破碎的瓦砾与燃烧的大火揭开了城市暴力活动的序幕。

1982年3月，古斯曼指挥200名武装人员打开了阿亚库乔的监狱，放走了200多名犯人。在秘鲁朝野一派喧哗声中，古斯曼代表“光辉道路”宣布，这不过是牛刀小试，武装斗争将进入第二阶段“游击阶段”。此时的“光辉道路”，一方面利用前几年在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贫困地区建立的根据地与地方政权组织，向政府频频出击，攻城略地；一方面又将土地分给群众，广泛施恩于民众，向秘鲁的下层组织渗透，使全秘鲁25%的县一级政府都受到了古斯曼的影响与控制，一些边远地区的县政府甚至由“光辉道路”的“人民委员会”取代，秘鲁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无法行使权力。

此外，“光辉道路”还在境外广结盟友，与德国、法国、瑞典和墨西哥

等国家的恐怖组织结成伙伴，并拉拢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怖组织。8 个国家的 39 个组织建立起“光辉道路”的支持网络，为“光辉道路”的恐怖活动提供国际援助。至此，“光辉道路”实际上成了国际性的左翼行动组织。

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古斯曼又宣称“光辉道路”的武装斗争转入了“战略均衡稳固阶段”。这意味着古斯曼认为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与秘鲁政府正面对抗了。此后，“光辉道路”的暴力活动步步升级，“武装斗争”实际上就是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打击的对象已经不分青红皂白，使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活动范围也从乡村扩展到首都利马等大城市。仅 1986 年 8 月，秘鲁经济和财政部、能源和矿业部、劳动部就先后发生多起爆炸事件，接着首都利马的一些高压输电塔也相继遭到破坏，使秘鲁的社会财产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截至 1988 年 6 月，这类暴力活动已经导致 9000 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官员、执政的人民党成员和反对派阵线左派联盟成员、政府军军官、警察以及“同政府军进行合作”的农民。如果说，“光辉道路”在萌生的时候还不乏一定的反剥削、反苛政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此时的“光辉道路”就完全扯去了自己身上披着的体面外衣，堕入了恐怖主义的泥淖了。他们唯“左”为上，唯“左”是从，认为只要能对秘鲁政府产生威慑作用，就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做。极左恐怖组织的理论被古斯曼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古斯曼看来，他们的行动不仅要消灭政界、军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及政府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秘鲁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公众丧失起码的安全感，从而对政府失去信任，以便为武装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如果政府无力控制恐怖活动，那当然正合其意。如果政府为了控制局面而采取镇压措施，那么随着双方刀对刀、枪对枪的血与火的较量，政府将被迫采取严厉、残酷的手段，从而暴露其反民主、反自由的真实面目，这样也能唤醒更多的人拥护“光辉道路”，从而实现其武装夺取政权的目的。为了实现其目标，走火入魔的古斯曼对一切怀疑和阻碍其左倾极权的人都痛下杀手，连他“静坐”两年才苦苦追求到的奥古斯塔都不放过。开始几年，他还能容忍作为“光辉道路”二号人物的妻子提出的不同意见，可当他发现后者对他的政策问题提出批评时他就忍不了了。他迅速地为她指明了“光辉道路”：人们发现她在自己住处无缘无故地自杀身亡。不久，埃莱娜·伊帕拉吉雷便取代了奥古斯塔的位置。

自“光辉道路”成立以来，秘鲁政府就一直对其采取围剿，但都未能奏效。这个结局助长了古斯曼刚愎自用的气势，数年的暴力行动虽然连连得手，但是离最后胜利总有一步之遥，这也使古斯曼日渐急躁，再加上藤森总统对恐怖分子毫不留情的打击，刺激了古斯曼傲慢而脆弱的神经，使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光辉道路”的战略反攻阶段到了。由此，“光辉道路”的恐怖活动有增无减，首都利马更成为其攻击的首选对象。1992 年 2 月 11 日，“光辉道路”一天之中就在利马制造了 36 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发生在美国驻秘鲁使馆旁，当场炸死了两名守卫使馆的警察。7 月 16 日，古斯曼又成功地导演了利马大爆炸。在利马繁华的米拉弗雷斯商业区，“光辉道路”引爆了两辆装有 300 千克炸药的汽车，造成 21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300 多座建筑受损，创下了自 1980 年以来由暴力事件造成伤亡的最高纪录。一时间，国外游客视利马为“死亡之域”或“恐怖之城”，以至秘鲁参议院安全委员会主席伯尔也无可奈何地说：“利马现在是最危险的城市，每天都有恐

怖事件发生，‘光辉道路’正在将国家带入一个黑暗时代。”6月5日凌晨，“光辉道路”将一辆装有600千克炸药的汽车引爆，炸毁了利马的一家电视台，炸死炸伤20余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计。

丧心病狂的古斯曼眼中似乎再也没有一块平静的地方，无论是军事部门、警察机构、外交使团，还是研究单位、商业中心、工厂企业、民宅学校都成了他的眼中钉，他千方百计地要将它们铲除干净，就连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也挨了他的两枚炸弹。仅1992年上半年，“光辉道路”就制造了近700起暴力事件，造成4000余人死亡。在一系列的爆炸声中，秘鲁成了世界上恐怖活动最密集的国家之一，患了“恐怖癌症”的秘鲁让古斯曼与“光辉道路”这个血腥的恐怖组织名扬世界。

古斯曼看来与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接管政权的准备，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在他的夺权道路上出现了克星。他就是秘鲁新总统藤森，一个颇有“武士道”精神的日裔秘鲁人。

走下神坛的古斯曼

秘鲁警方从来就没有轻视过古斯曼与“光辉道路”，可以说“光辉道路”的崛起过程就是秘鲁警方的围剿过程，但是面对古斯曼首尾结合、攻防自如的组织体系和游击战术，秘鲁警方的行动却每每以失败告终。自1984年起，秘鲁政府对“光辉道路”加大了围剿力度，几万大军长驱直入“光辉道路”的老巢阿亚库乔，但因为走漏了风声，“光辉道路”整个组织及人员在一夜间销声匿迹，全副武装的秘鲁警方仅仅抓获200多个什么也说不清的“外围”成员与一大堆古斯曼来不及带走的“贡萨洛著作”。1986年，秘鲁警方虽首战告捷，抓获了“光辉道路”的军事领导人奥斯曼·莫洛特，但随之发生的每天都有政府官员死于非命的事件却使警方的脸面尽失，只能马不停蹄地疲于奔命，卫护党政要员。没想到，以莫洛特为首的300名“光辉道路”成员进行了监狱暴动，待警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镇压下去后，古斯曼又利用此事大做文章，煽动起当地人对政府的仇恨；并且“光辉道路”的武装力量借此壮大了。因此，在秘鲁当局看来，古斯曼完全是一个“天才蜘蛛”，随时随地都会补织起破碎的“蜘蛛网”。

古斯曼的厄运是从1990年阿尔伯特·藤森上台才开始的。这位先祖来自东洋小国的秘鲁总统，骨子里还是流着日本人的鲜血，很有些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藤森1938年7月出生于秘鲁，但其父亲是30年代才移居秘鲁的日本人，因此，日本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但奇怪的是，这位日裔秘鲁人虽然会四种语言，唯独不会讲日语。藤森在秘鲁接受高等教育后又出国留学。由于学有所长，1984年，他出任国立利马莫利纳农业大学的校长，1987年担任全国大学校长协会主席，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专家。藤森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对政治很感兴趣。看到秘鲁的混乱局面，他也是痛苦不堪，有心从政，用自己的思想把秘鲁治理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准备竞选参议员，但他姐夫告诉他：“如果你想为秘鲁出力，最理想的道路就是争取当总统候选人，登上权力之巅。”藤森认为姐夫所说有理，于是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联络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全部是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了“改革90独立运动”，参加1990年的秘鲁大选。大选过程中，很多人都准备看藤森的笑话。他们不相信一个书生气极浓的人能在大选中胜出，成为秘鲁总统。

但是，选民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藤森的信任。文人藤森在大选中胜出，成为 1990 年秘鲁的最大新闻。

藤森本质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文人，尽管他已经当选为秘鲁总统。但是，他就任后放的第一炮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其施政纲领中，藤森把目标指向秘鲁最大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明确指出，“光辉道路”是危害秘鲁民主政治的大敌，扫荡这个恐怖组织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藤森开出了 100 万美元的高价，悬赏古斯曼的人头，声称无论是谁，只要捉拿到古斯曼，立刻就可成为百万富翁。他向国民发誓，要在他 1995 年第一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还秘鲁以安宁，打击恐怖组织及其成员，并连续发布许多命令，给予秘鲁警方和军方充分的行动自由。藤森的举动，着实让人吃了一惊。一直停滞不前的反恐怖行动，由于藤森的推动，从此顺利地开展起来了。人们不得不对这个戴着眼镜的前大学校长刮目相看。

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藤森虽然担任了秘鲁总统，但国会和最高法院仍然掌握在反对派手里。他们对藤森大刀阔斧的改革举动处处掣肘，因此，行政当局与立法、司法机构经常发生冲突。藤森认为，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他的改革措施将无法贯彻下去，届任期结束，他无法向选民交待。因此，这个文质彬彬的总统冒出了一个念头：发动一场政变，把干扰改革的立法与司法当局赶下台去，放手进行改革。征得军方的同意后，1992 年 4 月 5 日，藤森发动了政变。在向全国国民直播的电视讲话里，藤森公开指责国会和法院腐败，干扰了他的改革和打击“光辉道路”的行动，助长了恐怖活动的猖獗。他说，现行的民主体制是骗人的，其服务对象是特权阶层，因此，他不得不暂时终止宪法，解散议会和最高法院，将国家军、政和立法、司法大权独揽一身，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推进全面的改革。藤森一声令下，秘鲁军警紧急行动起来。他们逮捕了一些反对派人士，软禁了议会议长，接管了议会大厦、大学和新闻机构以及各个政党、工会的总部所在地，4 月 5 日的报纸开出了“天窗”，学校全部停课。通过这场“政变”，藤森集国家大权于一身，成为秘鲁的铁腕人物。7 月 24 日，藤森还宣布：“将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恐怖活动。从即日起，凡造成人员伤亡的各类恐怖活动均视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严惩。”8 月 16 日，藤森再次强调：秘鲁政府的头等任务就是同恐怖分子作斗争。

在藤森的推动下，秘鲁的情报、军事、警察及其它执法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速运作起来了，多年来这些没有起色的反恐怖组织很快便一改老态龙钟、老眼昏花的形象而变得耳聪目明、身矫形健。7 月下旬，秘鲁警方接到密报：“光辉道路”的最高领导人古斯曼和另外几位首领又在策划一场比利马大爆炸规模更大的恐怖活动。藤森闻讯后马上取消了预定的西班牙之行，宣布首都的紧急状态再延长 60 天，亲自率领反恐怖部队控制首都局势，并成功地抓住了古斯曼情报网中的 16 位情报人员，切断了他的耳目，让古斯曼成了一个聋子、瞎子。

耳目尽失的古斯曼仿佛嗅到了什么特殊味道，马上龟缩到他在阿亚库乔的根据地。任凭反恐怖部队在军事管制中将利马翻了个底朝天，他始终坚守偏隅，一动不动。

8 月，一向慎思诡行、神出鬼没的古斯曼耐不住寂寞了。他准备在下一月即将到来的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500 周年活动上再动动脑筋，策划一个比利马大爆炸更“辉煌”的行动，以打击藤森政权的气势，扭转自己的颓势。

急于求成的古斯曼此时犯了他一生中再也无法挽回的错误。他不仅乐观地判断了形势，对藤森政权展开全面攻击，使自己的力量全部暴露，还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群众基础，没有料到多年来几近疯狂的血腥屠杀已使“光辉道路”人心尽失，而且也使它失去了它的左派盟友。连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秘鲁正统左派的代表罗伯特·桑特也指斥他：“‘光辉道路’篡改了左派为之奋斗的所有目标，以恐怖替代了秘鲁工人和农民运动。”这时的古斯曼在利马已经是过街老鼠，可他还以为有人会在危急时为他通风报信，就如同1984年那次为他传递情报，从而使秘鲁警方扑空一样。

可是，这一次没有人再向他通风报信了，反而是他的行踪与计划都被“线人”及时报告到秘鲁反恐怖局。秘鲁特别警察秘密行动起来，拉网式的“世纪大搜捕”开始了。古斯曼在天罗地网中终于锒铛入狱。

一度几近神化的“杀人魔头”、“革命领袖”被投进了秘鲁反恐怖局总部卡亚俄海军基地看守所，成了那里的第1509号犯人。古斯曼的入狱，不仅大大提高了藤森本人及秘鲁政府的威信，也给“光辉道路”及秘鲁的另一个恐怖组织“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以巨大震撼，恐怖分子或是远避他乡，或是转入地下，许多惶惶不可终日者则向政府投诚。在古斯曼被抓两天后，就有100余名恐怖分子向警方自首。

为了乘胜追击，秘鲁最高法院还于10月9日公布了一项新的决定：将恐怖犯罪的最高惩处刑罚从原来的25年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将恐怖组织的头目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以叛国罪来处罚颠覆组织的头目及对凶杀案有直接责任的追随者。这样，按藤森自行修改的宪法，有凶杀责任的恐怖分子可以同有叛国罪的政治犯一样，被判处死刑。

新的惩处规定具有更大的震慑力，也使许多了解恐怖组织内幕的知情人坚定了与政府合作的决心，有关恐怖分子犯罪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警方手中。根据这些举报的线索，10月19日，警察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活动，逮捕了“光辉道路”第三号人物拉米雷斯与其他8名领导人及12名成员。28日，反恐怖活动再传捷报，“光辉道路”另一位领导人马西瓦尔·瓦曼，即媒介曝光中出现的“孔多尔同志”，在阿亚库乔省与其他32名同谋一起被保安部队抓获。

“光辉道路”显然是碰到了克星。自1992年4月5日秘鲁政府执行藤森新的打击恐怖行为和反颠覆措施以来，秘鲁军队和警察特勤队共抓获恐怖分子2479名，有70余名恐怖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古斯曼在戒备森严的高墙里也不得不咀嚼多年来他自己种下的苦果。多年来，为了避免功高盖主的情况出现，他已将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排斥在领导机构之外。20多年的个人崇拜令他的任何接班人都无法控制局面，更不能指望他们把自己救出监狱。要让他们像自己过去那样，两三个月就能恢复元气，那是不可能了。连藤森总统也认为“光辉道路”现存领导人都不具备接任最高职位的“政治水平”。看来，这一次古斯曼是走投无路，死到临头了。

9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在库斯科省的安迪恩城监狱里，监狱长临时宣布取消固定的探监日活动，安排一个特殊节目。他把所有在囚的“光辉道路”成员集中在一个大房间的电视屏幕前，电视打开后，身着1509号囚衣的古斯曼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他神情沮丧，沉默地随着警官的命令一件件把衣服脱下，然后转过身来让人们看清楚，他的身上并没有受酷刑的痕迹。继而，他

又驯服地按警方命令，行了个“光辉道路”内部的军礼。

警方让古斯曼表演“节目”并非只是为了羞辱古斯曼，而是要让他在众教徒面前露出其真面目。刚开始，在得知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沦为阶下囚时，古斯曼的信徒觉得天塌下来了。正如一名长期在监狱里为囚犯们提供宗教服务的比利时牧师所说：“这就好比教皇突然宣布说上帝没有了，请想象一下上帝的消失对全世界教徒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受古斯曼影响多年的人根本不相信古斯曼会落入警方手中，他们是他们顶礼膜拜的上帝，上帝怎么会被凡夫俗子抓到呢！这一次，古斯曼的追随者们才第一次开了眼：原来他们的古斯曼并不是上帝。

为了让所有的人正视古斯曼是个囚徒而不是神，摧毁古斯曼的偶像形象，警方也将录像向全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滚动播出。

警方这一招无疑在“光辉道路”的老根据地产生了极大影响。惊诧于古斯曼居然也会被捕的人们看到电视中的“天才领袖”，在警察的口令下作出各种不伦不类的动作之后，才蓦然发现：原来古斯曼也可以被人任意驱使。一位妇女说，她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夜，一直到最后，她都希望自己看到的不是真的古斯曼。在利马市郊的维亚萨尔瓦多小镇不久就爆发了反对恐怖暴力、要求和平的示威游行，而维亚萨尔瓦多历来是古斯曼对利马发动攻击的老根据地。似乎是一夜之间，这里的居民才弄清楚，他们本是为了躲避各地的暴力才藏身于维亚萨尔瓦多的，可没想到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暴力事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严重。在确证了古斯曼并非法力无边后，这些居民生平第一次喊出了“不要恐怖”的呼声。

但是，“光辉道路”的恐怖道路并没有走到尽头。从古斯曼入狱那天起，“光辉道路”的报复行动就没有停止过。3个月时间内，“光辉道路”就在秘鲁制造了600余起爆炸和枪击事件。12月26日，哥斯达黎加和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相继遭到汽车炸弹的袭击，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建筑物却严重受损。仅隔一天，一辆装载炸弹的汽车又在距日本使馆大门不到30米的地方轰然爆炸，使馆周围建筑受到严重破坏，20人受伤倒地。事件发生时，利马到处都插上了带有“光辉道路”标志的旗帜，猎猎舞动的旗帜犹如一面面招魂幡，搅得秘鲁人心神不宁。

当然，警方最不放心的还是潜伏在阿亚库乔山区崇山峻岭中的那一个个重新开始游击战的“光辉道路”的几千名成员。正如一名警官说：“我们砍掉了该组织的脑袋，但是它的整个躯体还是完整的。”极左思潮在秘鲁的边远贫穷地区的影响还是很大。十几年来，“光辉道路”控制了一些学校，在学校中开设宣传“光辉道路”的课程，影响遍及秘鲁的整个教育系统，甚至在利马的一些大学校园里都出现过“光辉道路”的标语口号和古斯曼的巨幅肖像。为了隔断“光辉道路”对教育系统的强大渗透趋势，藤森总统在1992年11月还专门下令，对进行叛乱宣传的教师处以无期徒刑。但是，长期被“光辉道路”灌输的极左思想并没有由此消除。在古斯曼被捕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告诉记者：“老师对我们说，古斯曼主席的被捕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我们的事业是无法阻挡的。”一位将军在秘鲁中部的一所丛林学校视察时，学生们对他的“欢迎”即是高唱歌颂“光辉道路”精神的歌曲。12月，警方又在首都利马查出6名教师，他们一直在一所大学的预科生学院里操纵一个“光辉道路”的活动小组。看来，藤森并非小题大作。一时后继乏力的“光辉道路”完全可以依赖他们成就斐然的教育成果，谁也不敢说这批对“光

“光辉道路”有着强烈好感的孩子中间不会产生出类似古斯曼的“恐怖天才”。呆在监狱中的古斯曼也并非死老虎。虽然警方费尽心机，践踏他在信徒中的偶像形象，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对古斯曼深表失望的“光辉道路”成员也表示：“他在警方面前会如此驯服，这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我们很难过。看到‘光辉道路’的代表人物会失败，我们也很伤心。我们的组织是个大家庭，因此古斯曼的被捕就好像使我们失去了一家之长。但是大家庭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会有别人来承担起领导的责任。使我们组织团结的是思想。我们崇拜古斯曼，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准则是贡萨洛思想。”这也就是说，即使警方能证明古斯曼是一个凡夫俗子，但是这个凡夫俗子却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思想。上帝的代言人可以更换，但是上帝制定的法则却永远不可能被人打破。因此，如何处置古斯曼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本来判处古斯曼无期徒刑是为了加强“光辉道路”的挫折感，让崇拜他的人逐渐忘却其神圣的光环，但藤森没有料到，濒死的古斯曼，身上仍有“永生”的“贡萨洛”思想。即使按照新通过的秘鲁宪法判处古斯曼死刑，他也会成为一个不朽的英雄和偶像，被后继者所崇拜和敬仰，就如同古斯曼崇拜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一样。因此，无论古斯曼是被送往太平洋上的圣洛仑索孤岛上囚禁，还是被判处死刑处死，他所代表的极左恐怖主义幽灵仍在秘鲁到处游荡，打击恐怖主义仍是秘鲁面临的长期的任务。 献给天皇的“特别礼物”

1996年12月17日，秘鲁首都利马。

太阳西沉，夜色逐渐笼罩了利马这座充满南美风情的城市，晚风中处处洋溢着木薯酒馥郁甜美的浓香，利马这座现代都市开始了它的夜生活。

日本大使馆灯火辉煌，庭院里，各式日本宫灯闪烁着迷离醉人的光彩。大厅里，献筹交错，笑语欢声，完全是一派热闹景象。

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正在官邸款待八方宾客。12月17日是日本天皇的命名日，每一年的这一天，日本驻外大使都要在驻在国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招待会。今年庆祝天皇63岁生日的招待会规模更为空前，出席宴会的人数高达800余人，被邀要人中除了秘鲁总统藤森以及他的众多亲眷外，还有不少国家驻秘鲁大使、秘鲁政府多位部长以及秘鲁的各界社会名流。青木森久穿梭于人群中，以特有的日本礼仪将晚会一步步地向前推进。尽管在晚会开始前，日本大使才得知，藤森总统因这几天要外出视察，这一次破例不能前来参加他每年都亲临的庆典会，但藤森的母亲、弟弟、妹妹及众多秘鲁内阁大员的来临同样使晚会声势不减，宾主都沉浸在日秘亲善的友好气氛中，青木森久的遗憾也很快消失了。从宾主乐意融融的笑脸与笑声中不难判断：晚会正步入佳境。

8点30分，似乎是为了使晚会的气氛更加热烈，官邸花园的围墙处突然连续响起6声巨大的爆炸声，硝烟弥漫处，只见一群头戴用五颜六色旗帜做成头套的蒙面人从洞口冲了进来，他们手提自动步枪与AK—47冲锋枪，喝令人们原地卧倒，同时投掷烟雾弹，迅疾逼近了宴会厅。与此同时，宴会厅里的几个侍者也变戏法般从蛋糕里取出武器，对企图抵抗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发起了攻击。里应外合，这群人在15分钟内便控制了官邸两层楼所有出口。

爆炸，钻洞，射击，扣人，一连串动作干净利索，让人眼花缭乱。宴会厅里的宾客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他们还没有分清这是庆典精心安排的表演节目还是飞来横祸，就沦为蒙面人的阶下之囚。

500 余名宾客沦为人质！这是秘鲁人献给日本天皇陛下的“贵重礼物”。青木森久愣在那里，八方宾朋愣在那里，藤森总统的亲属愣在那里。他们都没有想到，本来是件喜事的庆典，转眼间成了一场祸事。而他们，本来是日本大使馆最尊贵的客人，现在成了绑架者手中最贵重的筹码了。

这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次人质事件。它是继 1979 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后又一次外交使馆被占。与伊朗人质危机不同的是，那次事件中沦为伊朗人人质的仅限于美国使馆人员 54 名，范围也仅限于美国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劫持要人案件中，涉及高层人士数量最多的人质风波。身陷囹圄者有秘鲁政府的两位内阁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图德拉，农业部长穆尼亚斯特；还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略·奇里诺斯，反恐怖主义警察司令，国家安全机构的将军，他们都是藤森政权的栋梁人物。此外，藤森总统的母亲、妹妹与弟弟也成了恐怖分子手中的筹码。除了中国、墨西哥、美国等国的大使因公事提前十余分钟退场外，前来出席招待会的德国、法国、巴西、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使被一网打尽，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自然也不例外。在献给天皇的“贵重礼物”中，130 位日本人和日裔秘鲁人也“有幸”作陪。

美洲 33 国、全世界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里约集团纷纷发表声明和讲话，强烈谴责这起恐怖主义行为。12 月 18 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秘鲁武装分子占领日本大使官邸事件发表声明，谴责这起恐怖行动，呼吁武装分子释放人质。安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恐怖事件，并称这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次攻击”。在得知人质中没有美国人后，美国白宫发言人立即要求秘鲁不要与恐怖分子谈判。克林顿总统 18 日两次与藤森总统通话，表明他对事件的“关心”和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解决这一危机的决心。美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它正在研究派出一个训练有素的“反恐怖突击队”。美国国务院说恐怖分子不仅是对秘鲁的威胁，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自 1981 年以来，美国驻秘使馆已遭到 10 次爆炸和武装袭击。

日本政府对人质危机作出的反应最快。毕竟，事件发生在日本大使馆，被扣的大多为日本人，而且有迹象表明，恐怖分子这次是冲着日本来的，因此，日本各界对此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成立了针对此次事件的对策总部。桥本首相亲自挂帅，日本外相池田行彦 19 日乘专机飞往秘鲁，亲临前沿“阵地”，一方面与秘鲁政府进行协商，一方面与各国外交使团及当地日裔进行协调。从危机爆发开始，日本各主要电视台都把正常节目搁在一边，全力转播利马的情况，有的传播媒体一直在跟踪转播人质危机的全过程。被扣人质中日本人的名单、简历、职务都在电视屏幕上一一列出。仅确证人质数量就折腾了好几天。一向对自身安全很少担忧的日本人一夜间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日本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加强了警戒。

自然，受人质危机影响最大的还是秘鲁。秘鲁政府的日常工作完全陷入了停顿，国会两个星期内停止了活动，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这次人质危机引发了秘鲁的经济危机与政权危机。从 12 月 18 日开始，秘鲁股市快速下跌，去秘鲁旅游的人数迅速减少。正对自己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志得意满的藤森真是吃了一闷棍，政治形象严重受损。1997 年 1 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藤森的支持率已经从人质风波前的 70% 下跌到 40%。在秘鲁对 2000 年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中，藤森的支持率跌到了利马市长阿尔贝托·安得雷斯之后，仅有 26%。

“打破沉默”

策划这一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的是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它与“光辉道路”是秘鲁两个最主要的游击队组织，后来也成为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源起远晚于“光辉道路”，其影响也要小得多。如果不是因为这一起人质事件，人们大概不大可能想起还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毕竟，连“光辉道路”都快被人们遗忘了，更何况这小小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影响虽小，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与“光辉道路”是同一个祖先的产物，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源起于1983年。其时，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早已消失，古巴革命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因中央情报局的追杀，“游击战”理论的鼻祖、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也已作古。60年代那种火热的左派时代，已经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这个时候秘鲁却诞生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

“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名字来源于印第安人何塞·曼努埃尔·孔多尔坎基。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完成对印第安人的血与火的征服。何塞·曼努埃尔·孔多尔坎基率领印第安人揭竿而起，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当局暴政的起义。他的母亲来自图帕克·阿马鲁一世家族，图帕克·阿马鲁一世曾是比尔卡班印加王国的君主，后来在反对西班牙的征服战争中为西班牙当局所害。何塞·孔多尔坎基仰慕先人无畏强暴的精神，因此自号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不过，他的命运与他的祖先一样。1781年，起义失败了，他也死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手。图帕克·阿马鲁成了印加人无畏强暴、反抗强权的象征，因此，当维克多·波莱·坎波斯和他的战友们在为新组织命名时，自然想到了自己光荣的祖先，因此，“图帕克·阿马鲁”也就成为新组织的名字。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格瓦拉主义”为指导。与绝大多数左派组织一样，“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最终目标，而是根据秘鲁的“实际”，随心所欲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挥”与“嫁接”，从而形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怪物。它主张暴力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实际上，除了在主张改变现状与马克思主义有所吻合外，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半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即使是极左的格瓦拉主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也没有照搬。格瓦拉主张“游击战”，这一点它继承了。格瓦拉主张以农村为中心，在农村开展游击战，“光辉道路”也是这样主张的，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为了标新立异，显示自己不同于“光辉道路”，却主张“城市中心论”，在城市搞“轰动性的游击战”，实际上就是搞恐怖主义。由于“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主张改变现状，在秘鲁消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因此，它对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青年学生有一些吸引力。不过，“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吸引力远不如“光辉道路”，后者在全盛期曾达到1万人，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充其量不过600人。为了扩大影响，坎波斯曾想把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游击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拉美游击队”，但没有成功。

俗话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这句话用来形容“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是再恰当不过了。据统计，秘鲁在80年代至1992年有3万余人死于暴力，平均每年达1800余起，但是这诸多的暴力行为，99%是“光辉道路”所为，能记到“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名下的大约只有1%。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恐怖活动，数量虽然不多，但确实也有几件干得轰轰烈烈。如1984年，它袭击了美国驻秘鲁大使馆，从而一战成名。1988年1月7日，它占领了“利马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和美联社驻利马办事机构。1989年10月4日，它绑架了秘鲁某广播电视经理埃克托·德尔加多·帕克尔。三个月后，它又暗杀了前任国防部长恩里克·洛佩斯·阿尔扎尔。为了抗议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它又向美国大使馆发射一枚火箭。看得出，“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矛头是指向秘鲁的达官贵人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

常在河边走，难免水湿鞋。初期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并没有引起秘鲁政权的重视，直到其羽翼渐丰，秘鲁警方才对它警惕起来。1989年2月，在安第斯地区万卡约省的一家旅馆里，化名“罗兰多”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最高领导人坎波斯在睡梦中被破门而入的警方抓获，此时的坎波斯还是舆论不太熟悉的“罗兰多同志”，但他很快就让秘鲁各媒体刮目相看了。

坎波斯被关在坎多·格朗德监狱，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有“秘鲁最安全监狱”的美称。它地势陡峭，围墙皆以坚实的花岗岩砌成，许多花岗岩有几吨重。监狱除了派重兵驻守外，还拥有各种现代化的监视装置和应急装备，秘鲁警方声称其固若金汤。然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军师奈斯特·塞尔帕·卡托列尼却把坎波斯从固若金汤的监狱中救了出来，这次人质危机的策划者与实施人也是他。在“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中，他的地位虽然比不上组织创始人坎波斯，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几次较大的武装活动都是由他精心组织并付诸实施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如果离开了卡托列尼这颗冉冉上升的恐怖“明星”，那它的影响显然要大打折扣。而且，自坎波斯被捕后，他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领导人。

卡托列尼1953年出身于利马一个工会积极分子的家庭。1970年他父亲失业后，他即子继父责，担起了赡养家庭的重任，在一家智利人开的丝织厂当工人。没过多久，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就在厂中崭露头角，很快他当选为工会主席。1978年，智利资方私自裁减员工，卡托列尼带领250名工人进占工厂。这场劳资纠纷僵持了近一年时间。1979年2月，700名警察采取强硬行动，冲进工厂，卡托列尼率领工人与警察大打出手，警方开枪打死了六名工人，罢工事件以失败告终。此后，卡托列尼以涉嫌谋害警察被关进了卡亚俄监狱。卡托列尼领导的这次工潮虽然时运不佳，但是他已经让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曾经出面调停劳资纠纷的秘鲁国会议员约维尔·迪亚兹·坎塞科在谈及卡托列尼时，还心有余悸地说：“他意志十分坚定，又好斗成性，真是个闹事的主。”

对于卡托列尼而言，这次工潮惨痛的教训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他不再信赖依靠工会去斗争的和平手段，很快从一位工会领导人转变为“以暴易暴”的激进反政府分子。同年12月，他因大赦获释。几个星期后他就策划了一场占领联合国驻利马办事处事件，并且领导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最终迫使秘鲁政府释放了其它在押人员。